

女性时代风貌与“剩女”择偶模式

——基于传统择偶模式的社会学分析

左雪松 夏道玉

(浙江东方学院 社会科学部 浙江 温州 325011)

摘 要 随着传媒的推波助澜,“剩女”话题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既展现出女性择偶变迁的事实,又呈现了女性的择偶窘境。这一现象需要遵循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事实——逻辑诊断——范式建构——策略选择这一技术路径,探究当代“剩女”现象的生成机理、现实运行与调适机制。通过对传统择偶模式的社会学梳理,可以揭示其对都市女性择偶适用的现代症结,从科学发展观视界探寻当代女性择偶模式的变革。

关键词 剩女 权力 选择 模式 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1)04-0051-04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为推动女性婚恋意识的觉醒提供了特定的时空场景,诱发了女性对传统择偶模式合理性的种种质疑。跨入新世纪,伴随女性权力的崛起,部分职业女性又以择偶窘境表达自身的处境;“剩女”作为这种状态展示的典型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

由于传统婚配文化的浸染与性别比例的失衡,“有剩男,无剩女”作为婚配思维定式影响当代青年择偶观。当下稍带点调侃意味的“剩女”一词被世人广为谈及,2007年教育部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中将“剩女”界定为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的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的未婚女青年。公众把“三高女”(眼光高、人气高、收入高)和“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作为她们的绰称。传媒戏称她们为“3S女郎”与“剩族”。“3S”:Single(单身)、stuck(卡住了)、seventies(70年代出生的)。“剩族”则为过了最佳适婚年龄还有勇气继续为寻找伴侣而奋斗的女性群体,25~27岁为“剩斗士”,28~31岁为“必剩客”,32~36岁为“斗战剩母”,36岁以上为“齐天大剩”。就个体而言,比她们大的已经有了小孩,比她们小的也将步入婚姻殿堂,相比之下,她们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

一、女性的时代风貌

不可否认,这种客观婚配窘境引发“剩女”时代的来临,这种态势展现出女性时代发展与择偶选择

变化的因果关联。

1. 职业权力的崛起

都市女性呈现“白骨精”的特质,归咎于改革开放以来女性职业权力的崛起。第一,价值观的嬗变成为思想先导。“无才便是德”的信条被“半边天”的主张所取代,社会对职业女性不断地认同,各行各业涌现出大量女性精英,改变女性“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生存状态。第二,产业结构优化成为经济动因。女性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不断转移,引发女性职业横向流动与社会地位纵向提升,其规模及影响取决于产业结构优化的力度与水平。“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1]第三,城市化发展创造空间条件。城市空间的聚集效益日益明显,都市具有更好的发展机遇与资源,越来越多的优秀女性聚集都市实现人生价值,引发了择偶场景方式的革命。第四,科技进步弱化生理限制。科技进步导致男性体力优势日渐消退,女性越来越适应现代都市的工作环境与生活方式。

职业权力的崛起也影响女性择偶模式的变化。第一,话语提升与时间减少。职业化进程使女性经济独立并争取更多择偶话语权,但职业化的结果使女性择偶的时间减少,在不完全市场竞争中,由于传统性别机制与观念的存在,女性要获得职业成功必须付出更多的投入,造成择偶时间的减少。第二,人

格独立与心理依赖。女权主义特别强调经济自立对人格独立的重要性,以此摆脱女性生存中的物质贫困。但部分现代职业女性虽具备了经济独立的条件,往往深受传统婚姻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较强的婚姻依附心理,以此提高择偶标准排除内心不适。第三,职业理性与婚姻非理性。职业理性的盛行造成女性对婚姻的理性塑造,认为职业成功便会带来完美婚姻,产生等待事业成功再去考虑婚恋生活的直线逻辑,造成普遍晚婚。

2. 交往权力的崛起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交往权力是个人或群体在互动中将其意志强加给他人的一种能力。随着职业女性独立性的不断增强,其获得择偶交往的权力越发增多:一是女性拥有优势资源(白骨精)。在择偶交往中争取一定的权力必须拥有使异性为自己提供必要服务与利益所具备的必要资源。“白骨精”的特质显示“剩女”不会过分依赖男性而成为男权的附属。二是女性拥有共同体验(剩斗士)。社会学理论认为获取交往权力的途径在于反抗现存霸权。“剩女”的共同体验源于女性适从传统择偶模式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男人与女人作为婚姻市场的主体与客体,二者拥有不同的优势资源,在传统性别模式下二者的优势资源表现不同:女性的优势资源与家庭相关,男性的优势资源与社会相关。为什么会造成择偶资源的垄断呢?缘由在于现代社会是以社会领域的成功来评价精英的,男性对择偶资源的垄断程度远远高于性别意识形态倡导下的结构安排,女性基于知识储备与教育背景更能深切地感受择偶过程的相对剥夺。布劳认为:如果遭受严厉的剥夺,对它进行报复的愿望也可能会变成某种目的本身^{[2] 264}。因此,“剩女”在反抗择偶霸权时往往忽视其他变量的归属,情绪反应显得十分直接与非理性,极端情绪宣泄有时变成独身主义的宣言。三是女性获得特殊身份(圣斗士)。女性在反抗现存择偶意识形态中容易形成剥夺情绪的交叉感染,以各种方式的交流为女性整体择偶话语权进行集体抗争,当现存择偶模式受女性集体声讨时,个体的择偶诉求变成群体的婚配目标,由此个案择偶行为也获得群体支持——圣斗士。四是女性减少内在需要(圣女)。现代女性能够在没有婚姻带来物质保障的情况下也能靠自身的发展使自己生活得更好,那她就不必一定要依赖婚姻的制度安排谋划自身的生活方式与角色变动。布劳指出:一个人的要求和需要越少,为满足他们而产生的对其依赖性也就越少^{[2] 41}。现代都市女性往往具有较强的物质基础,为了追寻柏拉图式的情感诉求对择偶的物质生活与婚姻的程序仪式较为冷漠。五

是女性争取社会支持(同情女)。“剩女”群体在女性中鹤立鸡群,与其他群体相对区隔化——职业优秀与婚配期望较高,大众对于她们所处的婚配处境深表同情,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宽容,在日常话语中流露出委婉的叹息。

3. 知识权力的崛起

现代管理学理论强调个体社会地位的高下必须根据知识多少而不是基于裙带关系和财产多寡。后现代主义者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里,专业技术是取得权力的基础,教育是取得权力的方式^[3]。职业女性之所以有能力在择偶交往中与男性相互选择,与其所拥有的文化知识与教育背景密不可分,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是都市女性择偶变化的重要条件。“剩女”成长于教育改革时代,较之前辈有更多的机会享受教育资源,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信奉知识可以改变婚姻。

知识权力的崛起对女性的择偶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择偶范围缩小。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大,漫长的教育年限使女性择偶年龄普遍推迟,标准不断提高,按照传统的门当户对与现代的同类匹配观念,女性可选择对象范围不断缩小。二是择偶理想化。婚姻文化通过知识教育情景对女性进行隐性渗透,通过大量经典情感史料的阅读,有些物质雄厚的都市女性对唯美爱情与钟情模式情有独钟,易于确立对某种唯情模式或理想类型的坚信不疑,加重女性择偶的心理偏执。三是择偶几率降低,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往往具有较强的职业流动性,频繁的流动与广泛接触会加剧女性婚恋关系的中断。

4. 性权力的崛起

婚姻被社会学界定为两性结合的持续物质生活与性关系的社会现象。跨文化研究表明:一个社会中女性权力与男性权力越接近,女性就享有越多的性自由,一个社会中女性权力越小,她们的性行为也就越受禁制^[4]。女性主义性政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扩大女性的性权力^[5]。国内都市女性在开放氛围中受到多元性文化的影响,性意识逐渐由传统保守走向现代开放,改变了部分女性择偶的状态、进程与模式。首先,性自由带来择偶的主动。性革命赋予女性一种独立自主的性消费者意识,这种自我体验意识改变了女性在以往择偶中的被动,冲破了世俗礼法的性禁锢,改变了女性的精神风貌并提高婚姻质量。其次,性方式延缓择偶的进程。传统婚姻文化限定女性只有通过婚姻设置才能合法地释放性欲,现代都市女性不婚而性早已司空见惯,由“结婚而性”到“非婚而性”的转变造成部分都市女性延迟择偶时间与放慢择偶进程。再次,性取向颠覆择偶

的模式。伴随性观念的解放,少数时代浪尖上的女性弄潮儿以性取向为择偶主旨,颠覆传统婚姻异性结合模式,积极尝试创设同性婚配秩序,演变为“同志女”(Lesbian,简称LES)的反叛。“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倾向于把性解放摆在更为重要的地位,并认为只有通过完全摆脱异性恋才能实现女性的性解放。”^[6]

二、女性择偶模式的向度

从社会学经典文献梳理中可以寻觅出“剩女”的择偶困境集中体现在传统择偶模式对女性择偶行为的现代不适。

1. 同类匹配模式

同类匹配是主体倾向选择与自身外在条件相仿的异性为配偶。从传统的门当户对到现代社会的自由匹配,这种模式集中展现出主体择偶标准预设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两性择偶内外情景中往往存在不一致。对个体而言,是主客观标准匹配的不一致。“剩女”有时也在反问自己:如果自身条件不优秀也许不会有太高的婚配期望,如果物质不充裕也许就不会对唯美爱情执着。从群体看,“剩女”在各种群体的压力之下难以选择某种择偶标准适从,无法迎合社会大众的期待,造成个体动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一致。

2. 梯度错位模式

梯度错位是指男性倾向于选择比自己外在条件稍逊的女性为伴侣,而女性倾向于选择比自己条件更优的男性为配偶。即男性下位标准,便于获得婚姻掌控;女性上位标准,便于寻找婚姻依赖。根据外在条件差异,将适龄男女从高到低为A、B、C、D四类,按照梯度错位法则:A男—B女,B男—C女,C男—D女,最终被“剩”的是A女(剩女)与D男(剩男)结局是弱势的“剩男”易于被人忽视,优秀的“剩女”少有问津。条件优秀增加“剩女”依附的困难,“白骨精”的优势在梯度模式中不具备优势资源的潜质,部分女性在无法妥协的情景下走进“剩女”行列。

3. 资源交换模式

资源交换模式认为择偶是典型的社会行动,符合交换范式设定的维度。首先,动因。认为择偶吸引是由于对方所能提供的资源决定的,包括异性的一切有形与无形资源。其次,内容。认为婚配市场犹如商品交换,只不过两性既是交换的主体又是对象,婚配市场绝不只看资源的多寡,还十分关注择偶双方的优势资源如何。再次,条件。认为择偶行动成为资源交换模式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该行为的最终目的只有通过异性互动才能达到;二是该行动必须采取有助于实现择偶目的的手段。最后,

结果。认为择偶交换是当异性做出报答性反应就发生,当异性不再做出报答性反应就停止。上述A男性对A女的吸引力下降,说明A女提供的优势资源对A男来说不具有稀缺性。

4. 网络选择模式

网络选择模式是依据马克·格拉诺维特强弱关系的分类,揭示其对女性择偶途径的影响,聚焦于“社会资源派”和“社会支持派”的选择。前者证明弱关系对择偶的力量;后者得出强关系对择偶的意义。前者主张女性择偶要注重利用互动频率低、情感投入少、亲密程度低和互惠互利少的现代网络。因为这种网络存于群体之间,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可以作为传递择偶信息的桥梁。“剩女”的业缘关系使其活动空间不断扩大,接触的异性不断增多,选择方式日益多样,减少被“剩”的可能。后者主张女性择偶要注重利用互动频率高、情感投入多、亲密程度高和互惠互利多的传统网络。认为家人、亲戚、朋友、同事是“剩女”择偶的重要婚恋资源,利用传统网络方式增强择偶信息安全与提高择偶几率。

三、女性择偶模式的调适

1. 同类匹配的求同存异

现实生活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干扰,女性择偶实现同类匹配的概率偏低,如何突破这种模式困境?必须做到求同存异,既要重视内在同类又要兼顾外在差异。一方面,确认双方内在趋同的一致性。即择偶是基于情感需求为主要目的的,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相爱的双方既是爱者也是被爱者,单方面的爱慕不是爱情。“剩女”作为职业成功女性需要更多地考虑在择偶中涉及内在的情感投入。另一方面,正视双方外在差异的客观性,基于两性的不同特质优势资源可以在择偶中形成互补,促进各自发展。

2. 梯度错位的内外兼济

梯度错位造成女性择偶的囚徒困境是一种典型的“非零和博弈”,反映女性的最佳策略并非两性结合的最佳选择。这种择偶的纳什均衡存在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阐明女性在择偶中存在与男性不断地博弈,它实际上反映女性的个体逐利行为而导致两性结合失利的结局。这样造成择偶的纳什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相互矛盾,需要通过帕累托改进实现女性择偶的优化。因此,必须重新整合女性择偶的内外变量,在不减少男性择偶利益的情况下,女性通过策略调整使自身择偶处境变得更好,通过改变现有的交往方式与利益诉求来提高自身的择偶处境。在择偶标准成为婚恋市场供求关系均衡的主要杠杆时,女性完全可以从婚配梯度与错位中转变,实时调整择偶标准与诉求方向改变自身的境遇。

3. 资源交换的义利兼备

美国历史学家斯蒂·夫弗瑞指出:一个炫耀财富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目标定位为经济适用型的时代正在开启。由此“剩女”必须客观正视自己的生存能力与所处环境,认真反思自身婚配所面临的困境。在这个物欲膨胀与情感泛滥的混沌时代,人们的择偶标准总是在情感与功利之间寻找平衡,义利兼备成为“剩女”次生择偶行动的普遍共识,改变极端理想主义的情感取向与极端现实主义的功利取向让女性陷入形影单只的尴尬。经历金融危机的洗礼,义利兼备共识成为青年择偶的中庸之道,于是女性越来越倾向于择偶务实,造成“经济适用男”日益被职业女性热捧;“简单方便女”也越来越成为成功男士择偶的新宠。

4. 网络选择的软硬兼施

现代女性择偶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她们不断融合与协调各种婚配资源为其所用,对于社会关系网络既不是绝对区隔化也不是绝对趋同化,而是不断交织与融合。这就要求“剩女”择偶不能过分强调某种路径单一依赖也不能在多样选择中无从选择,要根据自身需求与现实状况权衡强弱网络的可比性,在次生择偶行动中做到软硬兼施。具体而言,其一,通过强关系可以提高择偶信度,通过弱关系提高择偶效度;其二,通过强关系提高择偶概率,通过弱关系提高择偶几率;其三,通过强关系提高择偶信息质量,通过弱关系增加择偶信息的数量;其四,通过强关系加深择偶互动,通过弱关系节约择偶成本。

四、女性择偶模式的变革

婚姻的最终目的是让女性的生活更美好,符合女性全面自由发展的择偶模式就是科学的模式,这是女性择偶的出发点与归宿。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也是探究女性择偶模式变革的重要视阈。

1. 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为现代女性的择偶提出硬性要求,寓意发展是提升女性择偶的硬道理,同时昭示女性择偶的硬发展毫无道理。“要坚持女性择偶的刚柔并济,既注重婚恋的物质内容又要突出情感生活。^[7]物质发展改变女性以往择偶的物质贫困,情感发展改变女性以往择偶的哲学贫困。

2. 以人为本

马克思划分人类发展的3个阶段也是女性婚姻发展的3个阶段:对人依赖的婚姻、对物依赖的婚姻、全面自由的婚姻。今天女性择偶的依附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盛行有其存在的客观根源,整个社会的女性还没有从羸弱话语与贫困物质中解放出来,女

性要实现从择偶的消极自由走向择偶的积极自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以人为本的过程。从个体来看,以人为本要以女性全面自由的发展作为择偶的出发点。要求女性择偶必须把主体意识发展作为其主要内容,完美的婚配模式应是一种生态发展模式,需要从女性合理诉求与积极主张出发变革择偶的行动逻辑。从社会来讲,以人为本要强调女性择偶价值的审视。在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模式下,以往对女性择偶的个体价值缺乏深层的哲学追问与冷静的理性思索,在社会学研究中常常把女性择偶个案行为简单地罗列为不具有社会学层面的意义,从而阉割了女性择偶个案的创新价值。

3. 全面协调可持续

首先,全面。婚姻内容表现为两性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择偶必须兼顾“婚”与“姻”的有机结合,处理好两性按照社会契约关系与法律程序而组建的共同生活与社会关系。其次,协调。择偶涉及双方共同生活,在工业化程度不高的状况下,家务责任的承担与社会公共服务的介入需要长期的协调。再次,可持续。择偶过程中的情感主线事关双方关系的可持续,双方只有在对生活的共同追求中才能使情感可持续发展,婚姻才能经得起时空间隔与诱惑的考验。

4. 统筹兼顾

一方面,女性择偶困境所涉及的范畴集中在3个层面:情感、婚姻与家庭之间的辩证。首先,情感是婚姻的道德基础,婚姻是情感的升华与导向。其次,情感是家庭的纽带,家庭是情感孕育的场域。再次,婚姻是家庭骨干,家庭是婚姻的扩展。另一方面,女性择偶困境所涉及的空间集中于两大场域,兼顾物质资料生产(职业)与人口自身生产(家庭),女性既要能职业复出,也要能实现婚姻的回归。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2.
- [2] P·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孙非,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 [3]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高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97.
- [4] 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84-185.
- [5] 李银河.性的问题[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91.
- [6]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269.
- [7] 左雪松,夏道玉.女性模式变量与“剩女”角色选择[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21-26.